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许明 主编

中国早期 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

王廷洽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许明 主编

中国早期 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

王廷洽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

王 廷 洽 著
责任编辑 袁 敏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郑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90,000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15-03657-X/G · 519 定价 16.00 元

2679/119

·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许 明

河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的这套大型丛书接近完成的时候，将是本世纪的最后二三年了。作为编者，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在充满风风雨雨的百年中国的一个转折点上，回顾和展望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辛的然而又是十分辉煌的路程。

应当说，在 20 世纪剩下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力图全面地在思想、学术、理论上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特别是近百年来，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动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探求他们在推动历史进步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适时的。这不仅仅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过去在理论上缺少相应的研究，从而削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认定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且也因为，我们深信，这项系列工程的展开是对百年中国文化运动的一次自觉的反省和展望。

“五四”以来，苦难的中国在各种阵痛中终于迈开了向现代化前进的历史步伐。然而，或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因袭的历史包袱太沉重，或许是客观的社会条件不允许，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路途，特别艰难和漫长。在这个过程中，一切进步的、爱国的、民族主义

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在力图体现历史要求的同时又啃咬着自己的灵魂，急匆匆地锻造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历史没有准备一个成熟的经过现代社会洗礼的知识群体，恰恰相反，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背负着责任，探索着前进的。而80年代，所有这些内在的矛盾：历史要求与知识准备、文化传统与社会批判、政治理念与大众心理……都充分地暴露了出来。知识分子的敏感心灵又一次经历了深刻的洗礼。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变动中，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选择的改造落后和分裂的中国的社会工程获得了初步成功——尽管经历了深重的坎坷和曲折。“五四”时期诞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一批朝气蓬勃的真正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热忱，深刻地影响和主宰了百年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变革。然而，与“推翻旧世界”的历史任务不同，80年代所提出的历史要求是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建设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中国。所以，80年代文化与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和困惑，对所有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讲，也都是全新的课题。

在沉重的历史负荷面前，素有“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中国知识分子丛书》将为有志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学者提供机会，研究在历史变革中知识主体的思想轨迹与社会功能，研究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心灵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历程。从而在更深的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担当起这套丛书编辑任务的是一群40岁上下的中青年学者，其中大多数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经历过“文革”以及80年代的开放改革，与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思想上的种种动荡和痛苦的反复。然而，他们执著地求索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性之路。有了80年代那段特殊的经历，就如他们的年龄所标志的那样，在思

想上开始走向成熟了，对现代中国来讲，一种沉稳的理性比之激情更为需要。清理极为复杂的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程，提高到学术理性的层面上去认识一个社会文化的载体——知识者的社会价值与功能，是建设新文化所急需的。由此，本着“开放、求实、建设”的精神，我们祈望一切关怀当代中国命运的朋友们支持这项事业并提供意见，惠赐佳作。

到本世纪末，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青年学者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然而，有什么能比参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更能激起生命的热忱呢？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完成什么，但重要的是他们在做什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是为序。

1992年6月6日于北京钟鼓楼

前 言

知识分子没有认真地探讨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是一件很可悲的事。现在推出这套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显然弥补了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大缺憾。应该感谢编委辛勤的组织工作和慧眼独具的卓识，更由衷地感谢王小盾博士为我提供了探讨这一问题的机会，以及为这一选题所提供的许多宝贵意见。

“名不正则言不顺”，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研究这一课题首先遇到的难题。目前最流行的意见认为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起源于俄国知识界。英文 *intellectual* 系由法国“老虎总理”克雷门梭（G. Clemenceau）在 1898 年首次使用，法文作 *intellectuel*。总之是一个西方社会晚近时候才出现的观念。可是从词源学的探讨上，似乎并没有找到明确的定义。因此，何为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人人言殊、意见歧出的问题。或以为是那些关心自身以外事务的人；或以为是那些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而掌握某些有文化价值的成果，因此而获得文化共同体的领导权的人们；或以为是那些不断批判社会和自我，永远寻求未知事物的人们；或以为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在学问、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道德等方面具有良好素质的人们，他们不属于任何阶级，而永葆自由思想的

权力；或以为应根据职业来划分知识分子，应把那些永不满足现状、不断创造、传播和运用文化的人们视为知识分子……其实，知识分子的定义并不需要有一种同一的界定，也做不到达成同一，因为，既然知识分子最具思想的独立性、求新性，要提出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定义是困难的。

不过，作为一部书籍的写作或一篇文章的写作，总需要一种前后连贯、一致的指导思想。王小盾博士提出了“知识分子是人类经验的传播者”的定义，堪称高度的概括。笔者在与友人谈及这一定义时，多赞不绝口。而且似乎也能找到语源学的证据，intellectual 中的词根为 tell，即为告诉、诉说之意。间或有朋友建议作些补充：知识分子是人类经验的总结者、传播者和文化的创造者。其实既为传播者，就必定有所总结，而传播的过程又是文化创造的过程。这一补充只是看上去更加完备一些。笔者赞同王小盾博士所界定的知识分子定义，遂以此贯穿全书。

在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起源时，往往把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对应于知识分子，从而认为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这显然是受晚近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影响所致，尤其是受康菲诺（Michael Confino）所提出的五项特征的影响更大。五项特征为：（一）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二）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五）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这五项特征的缺陷是过分强调了社会公德，而把知识分子最本质的属性放置一边而不顾。如果以此五项特征作为衡量知识分子是否产生的标准，那么就会有理由认为“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士“任重而道远”等确为知识分子的属性，从而认为其时的士阶层是知识分子。既然知识分子是人类经验的传播者，那么就有理由认为人类的最初经验产生于氏族社会后期，那

些经验便是形形式式的巫术。巫覡便是最初的文化人，或者说是原生形态的知识分子。这种观念其实早经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 G. Frazer）和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揭示，并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如果一定要认为“士”为最早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也有充分证据说明在商周时代已经出现了“士”的阶层，譬如《书》、《诗》中多见“众士”、“庶士”、“多士”、“列士”、“卿士”等名称；而且甲骨文也已有“士”这个字；甚至氏族社会的陶器刻画符号已经出现“士”形记事符号了。有些学者为了证成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为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而释甲骨文中的“士”为农事，甚至不顾历史事实地提出最早的“士”指武士。这些意见都是缺乏证据的。至于“士”的训诂问题，《说文解字》说得比较清楚，士训事，事训职。事又与史、吏等字义相近。由此可知，“士”即指当时从事社会职务的劳心者。氏族社会后期的杰出首领高阳氏实行宗教改革，“绝地天通”的实质是使人职与神职分离，使“民神不杂”，专职的巫覡群体产生，首批从事知识性、技艺性事务的劳心者从生产劳动中游离出来了。因此，无论是对“士”字的起源和考释，还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当起源于氏族社会后期的巫覡。

要解决知识分子的定义和起源问题，对知识分子作历史的考察是必要的，即对知识分子自身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知识分子形态，显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俄国只不过具有数百年的历史文化，其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于19世纪，是不足为怪的。若用俄国知识分子的特征，或用其他西方晚近的知识分子理论，去研究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问题，显然是一种片面的错误方法。我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夏代即已步入了文明时代。文明时代若没有知识分子，是难以想象的事，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若历史地考察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形态，就不难发现：原生形态的知识分子是氏族

社会后期的巫覡群体；三代的知识分子为人、神兼职，被称为“多士”、“众士”、“庶士”、“卿士”等的各级官员；春秋战国时代则出现了民间“士”与官方“士”的分野；秦汉及其以后各代的士大夫和“师”当为知识分子；在此基础上，魏晋南北朝则出现了“名士”；唐宋以后则为科举束缚的读书人；及机器文明传入我国后，知识分子的形态亦随之而起变化，出现了具有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当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后，则产生了革命的知识分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有助于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形态和特点的认识。

在阐明了这些基本的思想和方法后，似乎应对“早期”的概念作一番说明。所谓早期，其下限断在汉武帝时期。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理由：从社会形态上说，汉武帝真正巩固了“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从思想文化上说，其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把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主要注意力导向于诵读和注释儒家经典方面，而且也使其后2000余年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定格于儒家思想方面。这一传统虽然曾经遭到魏晋“名士”的冲击，但在唐宋时代却由于科举制度而得到加强，明清则完全继承了唐宋的传统。读经、注经、阐发经义、博取功名、继承传统文化遂成为汉武帝以后知识分子的主流。而武帝以前的知识分子则主要表现为对客观真理的探索，总结和传播人类的经验，以及文化的创造等方面；知识分子不受任何约束，属于思想独立、自由发展的阶段，而汉武帝以后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显然受到严重的束缚。因此，本选题“早期”的上限无疑是知识分子形成阶段的氏族社会后期，其下限则断在知识分子思想受到强大专制政治束缚的汉武帝时代。

在说明了这些基本情况后，也就确定了本选题所应该讨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巫覡的社会职事与文化创造；文明时代早期的知识界；对士阶层的重新探讨；学派林立及其思想文化成就；知识

分子在秦汉统一、稳定过程中的作用。

巫覡作为原生形态的知识分子，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认识。首先，巫覡是首批从全体生产劳动者中游离出来的精神劳动者。由于氏族社会的人们普遍信仰神灵，每从事一项工作，都会求助于神灵，巫术广泛地流行，而巫覡便是那些精神活动的物质承担者。他们的职事都是技艺性的，依靠形形色色的巫术来换取生活必需品，而不再从事耕种、渔猎等体力劳动。这种脑体分工出现在高阳氏宗教改革之时，所谓“绝地天通”、“民神不杂”，即首次诞生了一批精神劳动者——巫覡。其次，巫术是人类文明的阶段形式。法国著名的东方学者马伯乐（Gaston Maspéro）早已告诫人们不要以鄙夷的目光来看待它。根据现有的资料，我国氏族社会的巫术主要有祭祀和占卜两类。祭祀的本质为祈求神灵福祐的活动，它包括奉献牺牲和其它珍宝、祷告祝愿等仪式。祭祀的对象则有天地日月，山川泽渊、风雨雷电、林木禽兽、庄稼、祖先等，可以说凡与人类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可能作为祭祀的对象；占卜则是通过对某些神物奇事的观察而预知未来，以提高成功率。其时主要有星占（包括各种天文、自然现象）、梦占、兽骨龟甲占、筮占、动植物占等。这些事务都是技艺性的、精神性的。宗教思想、科学技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原始文化，都与巫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换言之，巫覡们创造了人类最初的文化。最后，巫覡是首批人类经验的传播者。由于氏族社会没有形成学校教育制度，各种文化和经验首先在巫覡群体中神秘地传授，又由他们逐渐地播向全人类。由于巫术的发展和分化，一部分成了政治制度，一部分成了宗教，一部分成了科学技术，一部分则仍为巫术而保留在民间。这些早为弗雷泽的《金枝》所揭示。

巫术在夏、商、周三代仍很盛行，而三代属文明时代早期。西周社会有“男巫无数，女巫无数”，各以其技艺的高低而所处的地位不同。巫覡群体的再度分化，便形成了“士”阶层。《尚书》、

《诗经》经常使用“多士”、“众士”、“庶士”、“列士”、“卿士”等概念，《诗经·文王》云：“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很清楚，西周的官员泛称为士。流行的观点认为“士”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低级官员、低级贵族。既为低级之官员、贵族，也形成于等级制度确定的西周社会，不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出现的。正由于此，春秋初期的管仲才有可能把士、农、工、商概括成“四民”的概念。三代文明初现，有文化、有才干的士人多么缺乏。《周礼》规定乡大夫之职曰：“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管子》也反复强调各地方行政应注意培养贤良俊才，如有“蔽贤”、“蔽才”，则犯有“五罪”。可见其时不可能有太多的士人散落在民间，绝大多数被荐举到政府担任各级官员，因此，三代的官员即为士，即为知识分子。他们担任的社会职事多为管理性和技艺性的事务，且多人事、神职兼任。《荀子·儒效》所憧憬的理想社会说：“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可见其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仍然指所担任的职事而言的。同时，三代知识分子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主要有：创造了文字；创造了青铜文化；建立了学校教育制度；编写书籍；等等。

知识分子在努力完成社会职事的基础上，提出了职业道德问题。有社会职业，就有职业规范和道德。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和表达形式。《尚书·胤征》：“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夏代以“法”的形式规定了职业道德。商代“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既对国

王负责，又对民众负责，“德”的观念已出现。周代以礼制规定了职业范围，“为人臣止于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无失其民”是礼的基本精神之一。《论语·八佾》：“臣事君以忠”，“忠”尚有忠于职守、忠于社稷、忠于公众之利等含义，而忠于职守本身也含有为国为民的意义。春秋战国时代的职业道德还有德、道、仁、义、信、智等命题，它们既是社会道德的命题，当然也是职业道德的范畴，因为职业道德属社会道德。

其时知识分子也有咨询的职能。史传尧舜时代就有咨询的事实。当时在决定由谁来领导治理洪水时，曾“咨四岳”，“下民其咨”，大家推荐了鲧。尧在位70年，又向四岳咨询，应把王位让给谁？大家推荐了舜。舜又通过咨询，选任十二牧。周文王有一个高级的智囊团，《国语·晋语四》曰：“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閼夭而谋于南宫，諏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周文王有事即同他们商议，有疑难即咨询于这一智囊团，使小邦周发达起来。《诗·皇皇者华》多次用“咨諏”、“咨谋”、“咨度”、“咨询”等词语。《国语·鲁语下》记载叔孙豹称引《皇皇者华》曰：“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諏、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闻之曰：‘怀和为每怀，咨才为諏，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周。’”先秦时代知识分子确实具有咨询的职能，咨询的事例不胜枚举。

谏诤与咨询具有相辅相成的意义。有道明君多行咨询，则鲜有失误；无道昏君多刚愎而专行，故多不仁不义之迹。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官员就会冒死谏诤。官员的谏诤多以社会利益、民众利益为基本价值尺度，去批判、纠正国君所推行不利于公众的政策、政事或决定等。官员能谏诤，当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具有不顾身价性命的勇气，既能理性分析，又善辩说，这些条件唯智者具备。商代国王武丁对于劝谏早有深刻的认识。《尚书·说命》曰：

“朝夕纳海，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这是武丁招得民间贤者传说，任其为相时，要求他时时事事规谏的记录。周代的保氏“掌谏王恶”，还规定各种官员以不同的方式来增长国王的才智，规谏行为，补察政事。《国语·周语上》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吕氏春秋·勿躬》称谏诤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贵”。我国历史上早有比干、微子犯颜直谏，召公谏厉王弭谤，单穆公谏景王勿铸大钱、大钟的生动事例。总之，咨询和谏诤是官员职事以外的社会职能。

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和行为规范也在春秋后期被提了出来。首屈一指的大知识分子孔子曾在鲁哀公面前全面地阐述了儒者的形象，即今所见之《礼记·儒行》，提出自立、容貌、预备、近人、特立、刚毅、仕宦、忧民、宽裕、举贤援能、独行、规为、交友、尊让等凡 14 种规则，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种：①“士志于道”，强调知识分子应有远大的志向、崇高的理想、社会责任感，应该有所作为；②“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勤奋学习，终身不辍，注意自身的修养，对己要严，能礼让，对人要宽，平时应注意刚毅性格的养成；③强调知识分子在对待财富、利益与真理、正义的问题上，不应该见利忘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财富和利益应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当然还可以归纳其他许多准则，如谦虚、谨慎、不自我夸矜等。总之，《儒行》比较详尽地阐述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和行为准则。

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所取得的最重要的人文成就当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那个时代是思想解放、思维的触角遍及宇宙

和人类的各个领域的时代，也就是人类思想进入了理性的时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对于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成就的研究和介绍，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笔者在介绍自己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心得时，有如下几个特点：（一）除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载的“十家九流”以外，又介绍了兵家和辞赋家的文化成就；（二）尽量利用考古材料，对诸子著作作重新认识，不采用疑古派的方法和观点。譬如《文子》、《孙子兵法》、《孙臧兵法》、《尉繚子》等竹简的出土，证明这些著作都是先秦古籍。《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不误，反而证明疑古派的方法和观点是错的，因此诸子著作的成书年代多采用《汉志》的记录，从而把《文子》、《列子》都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成就；（三）不仅介绍哲学思想、方法论等方面的成就，而且尽可能地作全面的文化成就的介绍，使读者能明白其时知识分子所取得的文化成就。譬如在介绍老子时，则对其书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作了介绍；（四）其中多为笔者研究诸子的心得、独立的见解。譬如：肯定《墨经》4篇为墨翟的成就，认为《大取》、《小取》非墨家作品，这样，作为墨家学派的祖师墨翟，不仅具有尚贤、尚同、非攻、兼爱、节用、节葬、非乐等政治思想成就，而且取得大量的自然哲学、科学技术、心理学、逻辑学等方面的成就，墨翟就成了一位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的科学巨擘；又譬如：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实质是要建立大一统的理想社会，是一位大一统思想的先驱；还譬如，认为《管子》一书内容复杂，是一部真正的杂家著作；（五）尽量做到深入浅出，以适应更多的读者，因此尽可能少引资料，必要时则既引原始资料，又作简单明了的解释。总之，在介绍诸子思想文化成就时，是把它置于知识分子与文化成就的角度进行的。

历史向建立大一统社会的趋势发展。战国后期思想家孟轲率先指出天下将归于一。纵横家张仪也明确地提出当时能统一天下者，非楚而秦，非秦而楚。于是称雄争霸的战争逐渐转向统一社

会建立的战争，结果秦国赢得胜利，建立了我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可是秦王朝并没有建立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这一艰巨任务为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完成了。知识分子在秦汉统一、社会稳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卓越的，概括地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在统一过程中提出多种有效的战略战术或策略；（二）制定各种统一的制度和法律，以稳定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三）为了团结周边的民族，处理边疆问题，冒险充当外交使节，并出色地完成各种使命；（四）提出与民休息的总策略，以恢复长期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五）完成从无为而治到独尊儒术的思想意识的转变；（六）取得了与大一统社会相适应的人文成就。当知识分子完成了大一统社会的建立，和取得了与之相应的文化成就后，其主流转向了尊孔读经、注释经典、阐发经义等方面去了。

当是书即将完稿时，传来恩师程应镠教授逝世的噩耗，遂使笔者方寸大乱，不得不搁笔一段时间，缅怀先生对我的培育之情。若此书能引起学术界的争鸣，若恩师在天有知，即以那争鸣之声告慰恩师亡灵！

1994年10月作于沪上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巫覡的社会职事和文化创造	(1)
第一节 巫覡的产生	(2)
一、 从“家为巫史”到“民神不杂”的时代	(3)
二、 巫覡是最早从事精神劳动的群体	(14)
第二节 巫覡的社会职能	(23)
一、 各种祭祀活动	(23)
二、 各种占卜活动	(61)
第三节 巫覡的文化创造	(77)
一、 巫术与宗教思想	(78)
二、 巫术与科学技术	(82)
三、 巫术与语言文学	(90)
四、 巫术与艺术	(96)
第二章 文明时代早期的知识界	(104)
第一节 政治官僚阶层	(105)
一、 国王为知识分子论	(106)